

《小团圆》对自我和人物的审视 ——反叛者的亲情和爱情——

崔琦

1. 《小团圆》的关键词及“雪藏”经纬——张爱玲坚持了什么？

由张爱玲著作权人宋以朗和其独家版权代理皇冠文化集团授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了张爱玲遗著《小团圆》。在《前言》¹中，宋以朗从张爱玲与其父母的通信中撷选了一部分，想找到《小团圆》如何诞生及一度“雪藏”的原因，从中我们也可以附带地收集到张爱玲本人对《小团圆》关键词的某些提示：

1、《小团圆》和其自传式散文作品内容上有重合，但这是“情节需要，无法改头换面”。²

2、《小团圆》是对自我也加以“不客气”的“揭发”的作品、但“并不是否定自己”；³

3、《小团圆》的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很多地方出人意料（“full of shocks”），是个“爱情故事”、甚至是个“热情故事”。⁴

以上可看成张爱玲自评《小团圆》的卖点，而张对《小团圆》的顾虑则在于“国家主义的制裁”，即女主人公九莉“不爱国”难为读者接受，但她意识到当时人们的国家主义观念已有改变，出版的时机已经成熟。⁵

宋以朗之父宋淇承认自己的国家观念也已淡薄不足为虑；顾虑在于张的前夫胡兰成会借此对号入座，把张“拖垮”。宋以朗建议对男主人公邵之雍“改写身份”，让其“死于非命”而“开不出口来，同时只写女主人公“爱他的人”而“不必研究他的心理”，以邵之雍多角恋爱因九莉与另一情人小康等会面被揭穿，九莉感到幻灭而结束小说。

张在一周后随即回信拒绝，“九莉跟小康等会面对穿，只好等拍电影再写了……在这里只能找 circumstances to fit the scenes & emotions。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⁷

张爱玲不愿意采用电影中常用的巧合、如“会面对穿”情节，不仅是因不符合她对小说这个文体提出的要求，即小说在提供与情感生成相吻合的具体生活情境之要求上更为严格；而且因为“对穿”所造成的止于“幻灭”之效果与她写这部小说的初衷甚或理想、即试图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之境界是背道而驰的。宋随即写长信指出小说出版可能给张爱玲本人形象带来的风险在于九莉本身，因为她被写成“爱没有条件”、“胆大、非传统的女人”，明知身为“汉奸”的男主人公“另外有好几个女人”，和其恋爱会为“社会舆论和亲友所轻视”还和他保持关系。宋认为张爱玲想把九莉塑造成一个“unconventional”的女人但是没有成功，反成了一个“unsympathetic”的人物，宋又提出改写邵之雍的身份，添写九莉小康会面对穿一节，并将九莉种种反常行为解释成因生活圈子太闭塞而“完全不知世情”，以期获得读者的同情。⁸

宋以朗的引用截止到此，从今天出版的版本看，张爱玲虽然终其一生在修改《小团圆》，但丝毫没有按宋淇的建议改动。邵之雍明显就是胡兰成、九莉对其心理的推测始终是小说叙述的一个重点；虽然最终和这个“汉奸”分手，并非出于民族大义，一度容忍邵之雍的多角恋这个情节也被保留下来，对于在爱情态度上种种引发了宋淇不安的（所谓“unconventional”的一面）九莉个人主义式的反社会的表现，张似乎并不想做解释和辩护。

我们观察小说对其他人物的叙述，会发现一个共通而有趣的叙述设计，叙述者并不顺着视点人物九莉的口气，用“父亲”（即文中“乃德”）、“母亲”（即文中“蕊秋”）、“姑姑”（即文中“楚娣”）、“弟弟”（即文中“九林”）等来称呼其家人，而是直呼其名，这似乎不可以简单地解释成对陌生化效果的追求，而是某种暗示：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物，在为着自己的存在苦苦挣扎的个人处境上和个人主义者的九莉并无两样；而且这每一个孤独的个人、包括父亲和弟弟都有着他们各自的“爱情故事”，其幕后都有着令读者始料不及的“shock”（比如九莉观察到九林对继母的暗恋时所用的感叹号“他爱翠华！”，观察到他人内心不能为世俗所容的暗恋时九莉经常使用“震动”、“惨然”、“凄然”等词。参见258页）。其中特别是蕊秋、楚娣作为叙述者登场所叙述的家庭往事/爱情故事、和九莉叙述的家庭往事/爱情故事处于一明一暗平行的，或者说是互文的位

置上。在孤独的个人之间表现出爱情故事上的互文性，是张爱玲所憧憬能表达出的“热情”的“爱情”故事的一种贯穿的话，对我“不客气”的“揭发”的所在，以及不同于巧合意义上的“戏剧性”情节设计的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呢？我试图将这些关键词作为推进分析时的重要提示。

2. 研究综述——《小团圆》在大陆出版后评议的大致走向

30年之后读到这部作品，无需为破坏了读者心目中的张爱玲形象而担心的大陆批评者的议论重心已经不在于对于九莉的反社会行为做道德裁判，但他们还是和宋淇一样注意到了九莉这个人物的反叛性。许子东着重指出蕊秋在小说中的分量，认为《小团圆》的主题是女主人公与母亲的关系，小说挑战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亲情观（暗指女主人公不孝）。他不理解为何张的母亲作为一个开明家长，让张接受新式教育、鼓励其社交反被怨恨，因归之于女孩“仇母恋父”情结。认为《小团圆》意义在于敢于率先描写这种“仇母”情结，而其中的情事描写则挑战了传统的爱情观和婚姻观。⁹

对此张爱玲的另一研究专家、本书主编止庵也明确指出：“《小团圆》主要写的是盛九莉和她母亲的关系”。不过他强调《小团圆》是一本清算之作，借此消解了对母亲的仇恨。¹⁰

止庵触及到了《小团圆》对人物的“揭发”这一侧面，就这一点，他在“外滩讲坛”中借评《小团圆》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即张爱玲是拥有两副“眼光”的作家，一方面是肯定人生价值的普通人的眼光；一方面是超凌于其上、指出人生价值的“非绝对性”的眼光。表现在《小团圆》中“凌厉、刻薄”的视线使有些人物（没有提及母亲和姑姑）被写得非常不堪。九莉是张小说中常常可见的两个极端的女性形象的集大成，温柔无辜的同时又厉害狠毒。她在观察对方的感情时一面总是在怀疑对方。¹¹

李欧梵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的“大地书香”节目上作了主题为“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叙述学”的演讲，从叙述学的角度和止庵所谓“眼光”之说形成了某种对话性的分析，指出《小团圆》因过于急就、与盛九莉主人公隔离得还不够。张原有的独特的叙述声音是一个“世故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个文体、也可以看成是张虚构化了的人物，最能代

表张的独有的叙事学。当张爱玲以前写别人、如上海小市民的时候，它使得张爱玲可以“不需要借用意识流的方式”（来进入人物的心理），而是可以“一下子超越”（应该是意指超越人我之隔、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下子隔离（与人物的内面相隔离、对人物加以评价审视），从而使这种叙述的声音能够行使冷眼旁观、审视的功能。但是李欧梵认为这个声音在张到了美国以后减弱了。我认为李欧梵对《小团圆》之指摘也许可以解释成由于九莉这个主要叙述者的出现，使得她的类似于意识流的内面的声音过于强大，盖过了在《传奇》中一直存在的对人物加以审视的声音。¹²

综合以上的批评，本文将在分析九莉在亲情与爱情上的反叛态度是怎样在小说的具体文脉中形成的同时注重分析批评之分歧点——即《小团圆》对于自我和人物在什么意义上保持了审视的风格，也即张自言的对人我“不客气”的“揭发”的所在这个问题。

如前文所述、本文还试图关注叙述设计本身的指意性：《小团圆》的主要叙述者还有两个个人主义者即蕊秋和楚娣，她们和文中的其它完全处在被观察、被叙述的人物形成一种落差，不仅是她们自叙，而且这种叙述设计本身都是对于小说女性书写主题的一种揭示与肯定。对于蕊秋和楚娣、我试图不仅从九莉这个视点人物所言所感这个角度、而是把叙述者所提供的情报中（特别是她们的自叙、也包括情节设计本身）所能看出的叙述者的同情的态度综合起来分析，揣摩叙述者对她们生活态度之评价。

3. 主要情节线索

小说分为十二节，从九莉在香港维大准备考试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开始，到她20年后旅居国外。前两节是局限在刚届成年，对母亲许多事尚未知情的九莉的视点内来写的。九莉同学多为本地富人子弟，少数派内地穷学生之一的她为母亲和老师安竹斯的期待所累忧心忡忡，同时她也为寄居于学校的自己的成绩决定着食宿等生存的现实问题焦虑。为脱离将临战事的上海，母亲和追求者毕大使、亲戚项八小姐等一帮朋友路经香港看望九莉。蕊秋第一次向九莉自述身世，告诉九莉她舅舅是为了家产继承权抱养来的，但随即又担心九莉会和舅舅争遗产。被触痛

了的九莉带着点反击的意味直言拖累了母亲的内疚不安，但并不相信母亲所言的要剩下点钱留着供给她，自己去找个归宿的话。九莉眼中的蕊秋行为诡秘，离去时怒气冲冲，与毕大使等人打麻将时输掉了老师安竹斯赞助她的八百块而未作任何解释，九莉深受伤害，决定无论如何要还蕊秋为她付的教育费。一个学期后战争爆发，九莉辗转寄居，为了口粮参加作防空员，对于战事爆发延宕了她担心的历史考试暗自欣喜不已，但是校方烧毁了所有成绩档案，九莉崇拜的安竹斯也被打死。九莉没有随众多同学去国民党迁都的重庆，和好友比比回到上海。

第三节是回到上海和楚娣同住的九莉回忆母亲两次从国外回来，直到自己去港这一段时间的往事。九莉借助楚娣，得知母亲当时的情人战死，也了解了她在香港时的难言之隐：与其交际的英国军官疑其为间谍并告密，所以怒气冲冲地离去。九莉隐秘地追溯着母亲与最初的情人、以及楚娣三人之间离经叛俗的情爱故事。一方面则叙述九莉从母亲处知道楚娣竟和侄儿发生恋情，为帮助他不惜挪用蕊秋托管的财产而彼此结怨。同时这一节也侧写乃德对蕊秋的悲哀等待的爱情；九莉在感情上依赖韩妈，但是意识到不结婚而留洋对于将自己作为一生事业的韩妈是一种背叛。第三节是回忆最集中的一节，九莉离开上海市的心情是“她遗下的上海是一片废墟”（第 132 页）。

从第四节开始，男主人公汪府官员邵之雍登场，九莉在爱河中感到离了童年就没有再感受到的永生的平安，她们非正式结婚。但是很快两人的爱情就因为小康小姐的出现而难于为继，九莉与燕山恋爱，并借此和战后逃难中的之雍彻底分手。流浪在印度的母亲回到上海，九莉终于实现宿愿，将从之雍那儿拿到的钱还给母亲，蕊秋没有接受黯然离开，临行前送九莉首饰作别，九莉不想想起母亲弟弟卖去首饰，借店员的口气暗自吐露了对母亲与弟弟的依恋（“他们永远知道的”见第 260 页）。但是文末叙及母亲死前在异国想和九莉再见一面被拒绝。九莉战后因与之雍的交往成为公众道德批评的对象，燕山亦与他人结婚，九莉虽自言从不想起之雍，但是常常记起失恋的痛苦，最后叙述她旅居国外后梦见有许多孩子都是她的，并梦见之雍，这似乎是唯一具有“小团圆”意味的画面，小说再一次以大考试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做结。¹³

4. 前两节中蕴含的叙述起点

在第一、二节中，其实隐藏着两个重要叙述的起点，第一是九莉在香港处境窘迫、又经战事逐渐形成的注重个人感受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原点；这个感情与思想原点决定了她与母亲及之雍的关系的展开。第二是人到中年前路堪忧的蕊秋时彷徨无助，又不能和女儿坦言的窘境，这里其实暗写了九莉对母亲的同情。在后文中这两条线索都有进一步的展开。

4.1 “不信教”的女主人公的登场

先来看这第一条线索，九莉近代史“念不进去”是有寓意的：

主要是因为近代史，越到近代越没有故事性，越接近报纸。报纸上的时事不但一片灰色，枯燥乏味，而且她总不大相信，觉得另有内幕。比比也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第45页）

在庞大无序的现实面前，好友比比鼓励九莉用对“身边事”的关注来填补在“世界大事”面前的空虚困惑。¹⁴ 作为绘画者的个人，其眼中看到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有关“个人”和“群众”对立的意识和在这两者之间做出的选择、在比比的比喻中已经很明确地加以表达了。正如后文中重申的那样、并不是九莉毫无信念或是不需要信念，而是她坚持从“身边事”中“体验”到的“信念”才是可靠的信念而不是群众的人云亦云（第56页）。九莉明确表明了对“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的反感，“她不信教”的反叛态度。¹⁵

总觉得势单力薄、对环境不安的九莉完全不讳言对于战争给她个人的“恩惠”、即可以躲避考试“非常快乐”——把自己的切身利益看作第一位的态度。这种坦言被加以夸张的描写（如在人人都在追问战事时九莉小心掩饰着“喜悦的浪潮”、见46页）。

在这种“不信教”、忠于个人利益的宣誓之后，九莉进而表现出不合作的个人主义的英雄态度。九莉热心于看小说而屡屡忘记记录飞机轰炸的时间，站长威胁要她去户外，她明知有被炸掉手脚的危险而依然微笑说“愿意”（第55页）。这固然可以看做是年少的九莉对英雄形象的试图模仿的姿态。这种憧憬的姿态在小说的后半部不时闪现，可以说是九莉对个人形象的一贯追求。

她如此激进的个人本位和邵之雍之间存在的分歧在后来的叙述中时有显现，邵之雍虽然并不讳言行为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且事实上他为了九莉挪用了办报的公款，但是他至少还是要声明自己办报是出于“对国家民族有好处”（第 196 页）。当九莉又一次出于个人动机，希望“战争一直打下去”时，“脸色一沉”的邵之雍显然认为是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性原则——看见那么多的死者而无动于衷（第 209 页）。

叙述者在此又插入一段九莉的心理独白，和第一节中的形成呼应。

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站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怎么会不想它继续存在？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如果他们是他们的选民，又还仿佛是“匹夫有责”、应当有点责任感。（第 209 页）

这种态度不仅和中国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相悖离，而且九莉不惮于明言大战的环境造就了她、甚至让她产生了依赖（“构成了她的地平线”意味着局限性也同时意味着保护），九莉再一次强调了前文中看到的作为处在被决定的弱小地位的存在本能地选择的个人本位的生存态度的正当性。而面对与自己更为性命攸关的战败，强调自己民众大义立场的汪府官员之雍，当然也不能就此指责他是虚伪造作，但是叙述者在此似乎有讽刺之意，之雍也许因为九莉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而大惊失色，但当九莉违心地转移话题，说我不过为了和你在一起时，之雍脸色为之缓和，虽然九莉的托词还是出于个人利益，但因为是对迷信个人影响力的之雍的恭维，使其转怒为喜。自恋倾向的之雍不具备审视自己行为的能力这一点，在小说中偶尔被加以不动声色的嘲讽，另有一例是之雍与比比的关系，在九莉眼中正襟危坐的之雍向比比传达战事剧烈只是为了在身体上接近比比（第 204 页）。

九莉和比比因为看出了这场景中的暧昧而反应冷淡，九莉和比比虽然是被之雍指责为“没心肝”（第 203 页），但是她们至少有审视自己内心愿望的能力，也能够轻易看出对方行为下真实的心理动机。这种揭发的能力也是她们做为个人本位者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在第二节末尾，她们嘲笑内地学生剑妮，其激进地忠于国民党政府但为了生存问题嫁给了在重庆已有妻室的魏先生，反在众多学生涌向重庆的浪潮中留在了香

港，这一情节也可以看作是对九莉和比比洞察他人内心能力的肯定。

4.2 蕊秋为何轻易输掉了八百块钱而毫无交待

九莉在香港时对蕊秋的叙述，还是限制在其未成年时的观感之内，不过处处留下悬念，向读者提示现实中的蕊秋和九莉保有的印象之距离。楚娣告诉九莉蕊秋不知为了情人打过多少胎，早已经身心交瘁。联想到其时蕊秋对自己爱情理想的重申：“我还是看不起钱，就算现在，我要是要钱要地位，也还不是没人要”（第125页）。这“人”指的即是毕大使，她说这句话时其实已经有了她在香港试图向九莉坦言的“找个归宿”的想法（第34页），如果放弃爱情她还是有退路的，这句话既是一种激越的表白，也是感到前途无多的蕊秋的内心动摇的表露，对当时看似淡然地输掉了女儿八百钱的蕊秋，似乎可以这样推测当时其心理：蕊秋在前途无多的时候依然故我，和年青的英国军官交往，结果被其疑为间谍又被告密，毕大使终于弃蕊秋取项八小姐。蕊秋失去了她一直据此安定自己内心恐慌的退路，但她毕竟是高傲惯了的，所以和毕大使在牌桌上斗气，因为那天晚上毕大使赢得最多，她不愿示弱，事后又不能和女儿坦言，只能一走了之。文中并未明写，但是九莉在知情后应该也理解了母亲输钱时的心理。她坚持还钱之举正如她自己所言，并不局限于这八百元钱之怨。

但是如果追问怨恨之来由，会发现九莉对母亲结怨的几项事由，其实都由楚娣作了解释。如蕊秋请吃下午茶时只好把九莉赶到阳台上去这一节，在当时的九莉看来是把自己赶到“后台”、怨气和她对母亲“造就”自己的内疚感相冲突，曾想到以跳楼表白自己的“真不过意”（第127页），经楚娣言破了下午茶之实，她应该理解了母亲的苦衷，因为后文即有楚娣情人来时她主动避开的情节（第168页），以及楚娣避开自己与之雍相会的情节。还有一件九莉患伤寒被母亲咒骂的事，成年后知道母亲为其破例接受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范斯坦大夫。九莉“很震动”但是不忘体察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毫无感觉，就像简直没有分别，感情用尽了就是没有了”（第170页）。感情用尽，也意味着不再因不知情而怨恨母亲，但是她还是没有放弃还钱这个心愿，所以还钱的含义还是要在误解之外继续寻找。在以下的第五节中试图解释已经理解了

母亲窘境之后的九莉为何还要坚持还钱夙愿的深层的心理原因。

5. 蕊秋自叙/九莉与其对抗关系

5.1 蕊秋自叙

有关蕊秋的家世叙述，是由她自己在怨愤中完成的，她其实是庶出的遗腹子，从小只能称生母为“二姨太”（和九莉从小过继给大房只能称蕊秋为二姨相似），受九莉外婆（即正室）“要争气”的高压教育下长大，违背自己的本意嫁给乃德，对于她大家庭生活是克己、压抑而充满势利的。连楚娣也为了营救情人而挪用了她托管的财产，更激发了蕊秋对家族的不信任感，通过蕊秋的自叙还可以看出的一点，就是深信西方的民主与平等的理念的她在留洋生活中感到的作为贫弱中国人的屈辱和无力，所以最终选择了女儿来实现自己变得强大的梦想。从自叙中还能看出来的很鲜明的一点是蕊秋抱怨中国人“不懂恋爱”，她心目中的理想的爱情是摆脱肉体关系的，精神性的。事实上到她色衰之后发现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并没有人给她多少精神性的爱情。叙述者虽然没有正面叙述蕊秋受到伤害的具体情节，但是正面描写了九莉在楚娣眼中的色衰之始、以及燕山最终弃她而他娶时九莉对那个“很漂亮、给母亲看得很紧”的“小女伶”的妒嫉（第 280、281 页）。这两者也可以说形成了暗写的对照效果。这些情节安排似乎可以看出叙述者暗示着对于蕊秋自叙中包含的怨愤悲哀，九莉完全是能够理解的。

5.2 九莉眼中的蕊秋

在幼年九莉的眼中、第一次回上海暂住的蕊秋就有着某种暧昧而不自知的意味，她意识到仍然爱着她的父亲沉默的等待，故此有父亲在场的时候总是“垂着眼睑、脸上有一种内向的专注的神气、脉脉的情深一往”；在父亲走后就开始餐桌训话、关于诚实、勇敢、重视教育等等的说教（第 72 页）。九莉知道不能说自己想说的，因为“随便说什么都会招来一顿教训”，“反正她自己的事永远是美丽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想到最坏的方面去”（指性的方面）。随着九莉的成长，她发现母亲真实的形象和她所奉行的教条、所拥有的自我像大相径庭，母亲对此缺乏自我意识这一点在她们之间筑起了高墙。一个象征性的描写是与蕊秋牵

手过街的感受，母亲的手指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的夹在自己手上（第80页），这段描写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是从九莉的感受来写的、也从蕊秋的感受来写，“感到她刚才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第80页）长期隔离的生活不仅给女儿、也给母亲造成了心理隔离，即使在幼年时期，她们也无法体验母子一体的幸福感，蕊秋不断地试图从子女那儿逃离出去，（一开始她的主要目的是逃离旧家庭生活，逃离抽鸦片的丈夫、但是从第二次回国起、就变成了一种没有具体目标的、对被囚禁感受的逃离）为了掩饰这种逃离对母亲角色的反叛意味、在九莉看来，九莉舅舅一家人总是要在母女之间做“隔离器”。生活在女佣男仆嘈杂的世界里，韩妈给她身体上的关爱，九莉似乎从其中找到了感情的替代，但是韩妈她们那身处人下、不得不处处压抑自我、漫漫无期的苦役生活让九莉不能认同——另外一种的隔离感：“她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第190页），这种隔离的意味，一半是个人中心缺乏自省力、为获得自由在身体上每每逃离自己的母亲给她的，一半是女佣男仆的旧世界散发出的悲哀无望的意味给她带来的心理上的反动，一种想逃离出去的欲望。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暗写了母女在经验上的重合。

逃到母亲处的九莉却不断被母亲和处于弱势的父亲联系起来，加以排除。对蕊秋要自己“留神学她们(指自己爱慕的女人)”的姿势的话九莉“羞得正眼都不看她一眼”（第117页）。

蕊秋把女儿从自己所拥有的女性化的优美中排除出去，又武断地认为女儿可以由自己的教育来加以补救。而九莉自我的形象，将来的恋情正因为都还在尚未成形之中，蕊秋粗暴的入侵，染指都让九莉感到受到骤然把自己变为他者而羞于接受。¹⁶蕊秋虽然希望在女儿身上弥补“我们就吃亏在太晚”上的遗憾，因此不顾身边人的反对(认为女子教育无用)执意要送女儿留学，同时她又心有疑虑，在理想主义渐渐退色的时代潮流下，她渐渐明白送女孩上学“不过是那么回事”，从女子自立的鼓吹者戏剧性地变为亲戚间的婚姻介绍专家。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婚姻市场上注定是个低能儿，除了读书毫无出路，把这种焦虑毫无掩饰地强加给女儿。九莉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心愿即“还钱”时是充满诗意的：“装在一隻长盒子里，埋在一打深红的玫瑰花下”（第120页）。但是蕊秋“像不

听见一样”她依然站在个人的本位上认为自己“真冤(即为了女儿)困在这儿一动都不能动”接着说:

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青的女孩子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九莉诧异到极点。从小教她自立，这时候倒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少女处女的话也使她感到污秽。

蕊秋又道：“我不喜欢介绍朋友，因为一说给你介绍，你先心乱了，整个的人都——都——”（中略）她不懂为什麼对她说这些。虽然刚说过“嫁掉你，”她以为是旧式的逼婚，再也没想到她母亲做媒做得顺手，也考虑到给她介绍一个，当她在旁边眼红也说不定。像她表姐们那当然是应当给介绍的……但是她想要电影上那样的恋情，不但反对介绍见面，而且要是她，第一先会窘死了，僵死了，那还行?当然她也从来没说过。海阔天空“言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第 120 页）

九莉以为自己受了教育，可以向往“电影上的爱情”，但这时她发现蕊秋把自己淹没在“少女处女”的人堆中，不相信她能真正实现个性与爱情。其实仔细分析蕊秋的话，她所顾忌的女儿的心理反应，和九莉自己所担心的“要是她，第一先会窘死，僵死了，那还行”如出一辙，和上文一样，九莉之所以深受伤害，是因为她尚在等待之中的自我过于娇嫩或者说骄傲使她没有余力意识到母亲对自己尚存的体恤，更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象少年时代那样空言理想，但缺乏力量马上证明自己。

对照小说最后的还钱场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九莉的还钱动机在于对自己力量的证明。但是麻木的蕊秋依然把女儿当做自己所有物，她不能自省的性格上的倾向，使得她依然无法理解九莉的动机。现在的还钱行为不是温情脉脉的表示，而是富于进攻性的行为，是即便理解了母亲的难言之隐依然不能了结的一种怨恨，仿佛是某种戏剧性的巧合，这一刻蕊秋又以从前看女儿的眼光提起给九莉介绍朋友的老话。“从前那时候倒是有不少人，刚巧这时候一个也没有”（第 251 页）。

对照这一段描写和上一段，可以发现有趣的对照，九莉用一贯的讽刺口吻嘲笑蕊秋对自己心理一无所知：乐于做媒只是为了可以寄托一点对“年青对象的幻想”。但她不再象以前那窘迫愤怒了，“她深信现在绝对没有替她做媒的危险，因此也不用解释她反对介绍婚姻，至少就她而

言”，这句话是傲然的，当年的她只能悲伤地说“海阔天空”地“言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而现在她用自己的成功实现了“言志”的可能，她总算把自己和蕊秋说的“少女处女”、只能在介绍婚姻中找到生路的“表姐们”做了一个区分。到母亲用曾经的女佣一样的“口吻”哭诉道“虎毒不食儿”为自己辩护时，九莉这才发现看似西化的母亲身上的母性，但是她并没有把女儿真正从自己身上分离开去，看成一个有自己独立意志的人。九莉对母亲的“拭泪”，还是忠于她“体验”的习惯，认为既然“竭力搜寻”而无感觉（第 252 页），也就不必心乱，然而她对母亲的误解——以为是对自己风流浪漫心存不满，因此编造的谎言——“是他们逼我的”却感到震动，她的心里在叫喊：“她误会了、我怎么会裁判起二婶来了”（第 252 页）。以女儿的体验，她有能力和判断母亲此刻所说的“逼”是谎言，正如之雍编的关于小康在与自己分别时才被强迫而发生了关系的谎言（第 265 页），以及她自己在比比面前撒同样的谎那样，这不过是应付场面的话，所以蕊秋自己也停止了扮演“忽然咽住没说下去”（第 252 页）。

奉行个人主义的九莉当然不愿意母亲误以为自己是嫌弃母亲的风流，对她做道德裁判，但是长期以来的母女关系的模式：母亲处于说教者的位置上，不允许女儿有自由意志最终扼杀了母女交流的可能，九莉想到向母亲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因此而厌恶母亲最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性关系上的“不在乎”对于长期受到的教育是何等可怕的背叛。在这里显然出现了悲剧性的反讽。

蕊秋为何一受到女儿的攻击就认为是因为自己的“那些事”？显然这一向是她的心病，了解这一点的九莉继续观察自己心理的发展：

她逐渐明白过来了，就这样不也好？就让她以为是因为她浪漫。作为一个身世凄凉的风流罪人，这种悲哀也还不坏。但是这可耻的一念在意识的边缘上蠕蠕爬行很久才溜了进来。（第 252 页）

九莉她知道母亲所背负的心理压力：一个漂泊天涯的风流女人是不配做母亲的。但是她非但没有为母亲的痛苦动容，而是又来嘲讽母亲缺乏自省，但是在对自我的观察之中，她也意识到，这种嘲讽是“可耻”的。

九莉完全不掩饰她想和母亲角力的残忍，她在伤心的母亲面前，还

有余裕“向大镜子检查自己的脸色”，同时，她也对自己下了判决，“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第 253 页）。这也许是叙述者审视自我意识的一种强大的意志力的表现。

6. 楚娣/九莉看楚娣

楚娣反叛者的形象也在对家族回忆的自叙中出现，她不仅对旧家庭拥有权力的男主人纵欲、阴暗的性心理反感、对旧时女人的屈服畏缩也有许多反感的表现。她和侄儿恋爱，而且还爱上过蕊秋的最初情人简炜。对大家感到阴暗无趣的楚娣从小在感情上依赖蕊秋，为钱与其结怨后知道人我之隔显然十分震动，她还钱给蕊秋之举和九莉还钱也形成对照。对自己情人侄儿“绪表哥”，她完全忘我，不惜和大房打官司、争家产来帮助他，但是“绪表哥”却和表嫂恋爱，借此摆脱自己，这件事使楚娣很受刺激，她希望能和其做“朋友”，“要不然放在记忆里受不了”。

至于楚娣自己对于“爱情”是怎样看的，并没有像对蕊秋那样明写其内心的失望——“一个女人年纪大了些，男人对她就不过是性”（第 247 页），但在小说中也偶有提及，她失望于九莉到底是个“平凡的女人”，为失恋所苦，她冷冷地说“没有一个男人值得这样”，这可以说也是对于男人世界的失望的表达（第 240 页）。

九莉对于楚娣有一种稳固的信任关系，在听到母亲说楚娣“偷了钱时”，她就“自愿暂停判断”，而相信楚娣自有其理由，对于楚娣离轨的恋爱，也不是从道德的判断，而是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上来接受的，她迷恋与楚娣绪表哥的三人相聚，因为在小阳台上的夜谈有一种回到童年的平安感，一场“乱伦”的爱情经过时间的清洗竟成为苦于缺乏一体感的九莉的家园象征。

7. 九莉看之雍/九莉和之雍的心理对抗

7.1 和蕊秋互文的之雍

九莉看之雍和她看蕊秋的视点很相似，她崇拜对方在相貌上的美点，甚至在用词上都相似。比如金色光泽的肌肤，目光下注的眼神（第 143 页）等等，同时九莉又嘲笑他们的自恋、相信自己的影响力、不能面对现实。

之雍是作为一个曾经入狱的社会革命英雄、九莉作品的崇拜者的形象登场的，而这些对于九莉不是没有挑逗性。但是文中九莉试图保持理智：“她蔑视年轻人的梦”（第 142 页），“对海的探海灯只是暂时把她塑在临时的神龛里”（第 148 页）。

之雍对于年幼者的坦诚庇护使得九莉感到永生的安宁（第 144 页）。但是理智马上就出现，她发现对知道自己所属的政党已经穷途末路的之雍来说，对自己表白爱情是对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的一种重申，对自我革命者身份的一种证明。他把自己和九莉的关系比作鲁迅和许广平；汪精卫和陈壁君，对于这种强迫的攀比九莉直接加以孩童漫画式的揭穿：“陈壁君的照片她见过……很丑。汪精卫她知道是个美男子”（第 150 页）。

九莉很快又发现之雍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影响力甚为迷信，把人看成资源、占有欲很强的人（第 152 页）。此刻九莉仿佛为一种张力所拉扯，她想在那个永生的爱河里多沉浸一些时候（第 152 页），但是又总是有一只木鸟在逼视着他们，“它在看着她。她随时可以站起来走开”（第 154 页）。这只不可能出现的木鸟可以看成九莉内心对自己的观察审视，这种观察是一种对既成的观念价值体系的剥除，让它们还原到原始的状态，这样之雍对于价值随意的攀附与借用、自恋与占有欲都被看得很分明。

这木鸟在紧接下来的在美国打胎的情节里突兀的出现（第 157 页）。这一次它从想象中闯入现实当中。这一段写得阴毒可怕，前文中出现的“远祖祀奉的偶像”和刚刚成型蕴涵在九莉身体中的胎儿的形似，似乎暗示着循环不已的生命本身对自我的某种注视、裁判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她自我成型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故此作为胎儿的形态蕴藏在她的核心），同时又是她一直感到恐惧，想加以逃避的。但是之雍身上所有的“疯狂”、换言之“可以说服自己相信随便什么”的一面一旦出现的时候，九莉还是马上起反感，感到“整个的中原隔在他们之间”（第 164 页）。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九莉感受到了之雍身上反理性的一面和自己的格格不入。

7.2 服从自己内心的乡音

九莉在相当长的一种胶着状态中容忍了邵之雍的多角恋，对其没有动

真感情的“滥交”确实可见无所谓的态度，原因在于她的爱情观，这一点在叙述对因自己而离婚的之雍太太绯雯毫不同情时讲得很清楚。

她不觉得他有什么对不起绯雯。那么美，又刚过 20 岁，还怕没有出路？

她不妒忌过去的人，或是将要成为过去的。（第 164 页）

前面的一句可以看成一句托词，后面的一句才是真的内心表达：绯雯已经是过去的人了，她失去的之雍的爱不可能再点燃了。这吻合了九莉在为之雍和小康之恋苦恼时的症结所在，九莉不相信爱可以是多角的，在之雍与小康交往的阴影一旦笼罩到两人的婚姻上，九莉自己对爱情的定义（无目的、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人）就开始折磨九莉，她认为小康与之雍交往只是出于权势的吸引（也就是在质疑小康的爱是有目的），但是现实朝着不利于九莉的方向发展：之雍想在小康身上找到的是类似于母亲理想中的一个假想的存在：头发不烫而能稍往里卷的清纯女生，九莉觉得被触到了痛处：凭她的理智，她可以判断这种清纯是假想伪装之物，但是她无法剥除之雍幻想的权力，而且之雍很快失势、小康依然和他“生离死别”，九莉马上失去了否定他们爱情的自信，按照她的原则，这一次轮到自己“成为过去”。

九莉不断地检点和梳理自己对现实的逃避，她心里对自己说“又来曲解了！因为不能正视现实”（第 220 页）、在这个接受不了失去爱人的痛苦而变得软弱的阶段，九莉并不否认屈服于之雍暗示的共有一个男人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有点什么地方使她比较安心，仿佛加入了人群的行列”（第 223 页）。

和在香港战事中一样，九莉终于战胜了“人群”的诱惑、回到孤立的自我中。和之雍分手，并不是因为要裁判之雍，而是因为像对她母亲那样，她觉得“一条路走到了尽头”，感情用完了就完了，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与他人永生一体的愿望过于强烈在现实中难于实现但毕竟是真实的，叙述者强调这并不是因为九莉“笃信一夫一妻制”（第 242 页）而是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的结果——“只晓得她受不了”。这里又暗合了第二节中“不信教”的个人主义者形象。

8. 结论

从叙述设计上看，这部小说并不是只是以九莉为本位，做自我抒发（包括母女关系）为唯一的叙述目的的小说。三位女性各自的回忆、人生经历、像拼图一样向读者加以看似无序的展现，目的在于呈现出时代转换期具有反叛意味的新女性互相叠印的心理历程和相似的苦闷，对此加以同情的描写——对旧家庭感到格格不入又为生存所苦；苦于人我之隔又不能放弃自我本位；追求“无目的”的纯爱不惜越轨、但现实的男性世界与理想大相径庭。也许只能说是她们内心对于纯爱本能的坚持使得这些热情的爱情的故事在“完全幻灭”之后没有陷入空虚吧。小说故事虽然看似对于母亲和三姑的越轨的情事做了“揭发”，但绝不是告发，正象九莉在叙述到自己打胎所说的“女人总是要把性命拼上去的”那样蕴含着悲哀的认同，九莉理解她们事与愿违的慌乱与悲哀，这并不是最终九莉和母亲始终保持心里隔阂的原因。并且在小说所有人物那里，无论怎样离经叛俗临界于人类理解力的疆界的爱情、都是作为超越于冷漠自利的人性唯一的可能性被加以肯定的。九莉虽然在性爱上比母亲坦率，在某种意义上也重复了坚持纯爱的母亲的心路历程，但是她们始终无法沟通。这种互文性让人想起那座叠映着两代女性情事的公寓背景，里面应该包含着张所理解的超越巧合、具有悲剧反讽的戏剧性吧。

九莉背负着向往西方文明的母亲没有达成的自我实现的重负，她始终既是母亲理想的载体，同时又是母亲内心焦虑、理想失落的最直接的感受者或说是被伤害者。九莉积极地把母亲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她内心中“童年的平安”、“永生的爱河”所表象出的与他人共为一体、毫无恐惧与焦虑的愿望，一直被母亲忽略而处于失落的状态中，故此成了九莉在爱情梦中最渴望被满足的愿望。

九莉在还不能证明自我力量的时期，对女子自立从信奉到彷徨，又极度自恋的母亲不能洞察女儿的自我和尊严被其伤害，九莉的这种屈辱感直到对母亲的误解消失、甚至确认母亲对自己的爱之后仍然存在着，所以还钱这个线索在小说中贯穿始终，九莉之所以念念不忘还钱并不能单纯看作为母亲的盛气所伤而采取的报复，看成是对自我成长进行确认的欲望是更为公允的。

九莉虽然宽容了之雍的一些露水姻缘，是因为她以为那不过是之雍

的末世感造成的心理压力或是想拓宽自己体验的疆界，不是她所理解的爱情。到了她发现之雍确实爱上了小康，对自己又出于对人的占有欲不肯放手时，九莉终于选择了和之雍分手，她的回归正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夫一妻制在现在看来是正统，但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是多妻为主流，所以九莉的坚持在当时还是有着前卫性)是个人主义者听从自己的内心体验的结果。

九莉和母亲及之雍之间的心理对抗，也是和缺乏自省能力者非理性的说教(如之雍的“好”与“不好”的理论、第282页)、对他人生命的控制欲做抗争，这应该说是张爱玲所曾言及的“揭发”的更为深层的含意吧。九莉忠实于自己内心的体验，从体验中求证信仰的个人本位理想，是这种抗衡的心理原点，对于这一点叙述者显然是持认同态度的。

至于九莉对母亲是否残忍这个问题，叙述者展现了真实的自我，可以说她承认、即“揭发”了自己对母亲的伤害是残忍的。但是对九莉一贯追求的雄性的自我像、忠实于自我体验进行自我审视、敢于特立独行的强大意志，叙述者都是嘉许的。小说末尾明确提出了“国人思想还潮”(第282页)的问题，也是经由相对理性渐行渐远的之雍而提及的批评。这对于贯穿小说始终的个人主义式的自我反思主题是个很鲜明的提示，因此我并不认同李欧梵所指摘的、叙述者对于九莉及其他人物缺乏审视的力度这个结论。

注解

- 1 宋以朗《前言》《小团圆》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 2 《前言》张爱玲 1976年1月3日致宋琪信
- 3 《前言》张爱玲 1975年7月18日致宋琪信
- 4 《前言》张爱玲 1976年4月22日致宋琪信
- 5 《前言》张爱玲 1976年4月4日致宋琪信
- 6 《前言》宋琪 1976年4月15日致张爱玲信
- 7 《前言》张爱玲 1976年4月22日致宋琪信
- 8 《前言》宋琪 1976年4月28日致张爱玲信
- 9 《小团圆》透露了张爱玲的什么秘密?
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4-07/
- 10 “外滩讲坛”: 5月24日马家辉、止庵对谈
<http://www.mingzong.com/news.php?id=3309>

- 11 同上
- 12 李欧梵 “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叙述学”
<http://www.rthk.org.hk>
- 13 宋琪在 1976 年 4 月 28 日致张爱玲信认为“小团圆”是在讽刺才子佳人的“大团圆”，但是如果把与母亲的关系也看成小说重要主题的话，最后的梦境中因为出现了被自己拒绝了的孩子，似乎可以看成是九莉亲情与爱情梦的替代性满足。
- 14 比比这个人物在个人主义观察者这一点上和九莉同调，但是在爱情观上却非常现实，和追求无目的的爱情的九莉格格不入。
- 15 同样的态度可见于 218 页，在探望躲藏在日本人家中的之雍回家的路上受阻，九莉联想到自己“违反了世界潮流”因而“泥足”的一段心理描写。
- 16 关于母亲在女儿身上寄托理想的自我像，而让女儿感到他者的侵入这一点，参考了『母と娘の精神分析』（クリスティアー・オリヴィエ 大谷尚文・柏昌明訳 法政大学出版社 1990）第一章「母たちの幻想」部分。